

藉五年規劃構建香港特色長期「照護體系」

議事論事

林順潮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將在九月出爐，月前公布的諮詢文件將安老列入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提出繼續貫徹「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優化跨境養老措施，並在區域合作部分強調提升規則標準互聯互通。筆者樂見香港的重要政策文件重視安老議題，建議兩條政策線可在首份五年規劃中有機結合，形成面向老齡化社會的長期照護體系。

香港人口高齡化正由長期趨勢轉化為迫切的民生挑戰。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二〇二五年年中，本港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約一百七十九萬，佔總人口約四分之一，標誌著本港人口高齡化情況顯著；按《香港人口推算二〇二二至二〇四六》推算，到二〇四六年相關比例將進一步升至百分之三十六。

香港人口老化加劇，安老需求日益迫切。截至二〇二五年六月底，社會福利署

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共有一萬七千零三十四人輪候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其中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八人輪候護理安老宿位；津助及合約院舍護理安老宿位平均輪候時間約十九個月，服務供需壓力持續增加。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正同時延伸至醫療服務、院舍照護、家庭支援、照護人力及公共財政等多個領域。

四層架構實現順暢轉介

筆者留意到，近年政府在養老安老政策上主動出擊，逐步擴充服務。《二〇二六至二七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增至一萬六千張，院舍照顧服務券增至七千張。跨境養老方面，截至二〇二六年五月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的二十六家院舍共有一千二百七十一名香港長者入住，覆蓋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七月起再增二家，認可院舍總數達二十九家。這些措施為改革提供了良好基礎，下一步須由擴充單項服務走向完整制度建設。

首份五年規劃可確立四層架構：本地服務托底、社區照護支撐、院舍照顧後援、跨境康養延伸，再由科技與金融提供支持。四層之間須能順暢轉介，讓長者的健康狀況和家庭照顧能力發生變化時，服務可以跟隨需要調整。

首先，要把社區照顧服務券建成居家安老的服務入口。目前服務券提供家居照顧、日間護理、復康、膳食及護送等支援，未來可在十八區地區康健中心、長者中心和社福機構增設「居家安老服務導航」，由社工、護士、職業治療師等共同評估健康、家居環境、家庭支援和經濟能力，及早配對防跌、慢病管理、營養、復康、陪診和樂齡科技。政策介入愈早，長者愈有機會延長在熟悉社區生活的時間。

其次，院舍政策要同時處理供應與質素。家庭選擇院舍時，除了關心有沒有宿位，也需要知道護理人手、失智症護理能力、醫療支援、感染控制、事故紀錄、投訴處理和家屬評價。政府可逐步建立統一

的院舍質素披露制度，並優化院舍券值調整和轉介程序，避免長者健康惡化後仍因在不合適的照護級別。

維持本地服務托底功能

第三，跨境康養應納入香港長期照護體系，定位為自願、有監管、有保障的延伸選項。大灣區內地城市在空間、院舍供應和服務成本方面具備條件，香港則在醫療管理、社福經驗、專業標準、金融保險和爭議解決方面具有優勢。跨境合作可以增加選擇，同時也要維持香港本地服務的托底功能，讓長者按健康、家庭、經濟和生活背景作出決定。

香港城市大學大灣區研究中心王小虎教授團隊的一項研究，梳理八百四十九份政府文件，並訪問調查二百零五名居於廣東的香港長者。研究發現，長者最優先關注醫療、健康紀錄和現金福利可攜；基本需要逐步得到保障後，需求會延伸至住房、日照照護、交通、保險、金融和法律支援。這項發現說明，政策應按需要層級分：

生命健康和基本保障由政府主導托底，多元生活服務則由政府統籌社福、醫療、院舍、保險、金融及科技機構共同提供。

最後，五年規劃須以結果衡量成效。除服務券數量、認可院舍和使用人次外，建議公布等候時間是否縮短、服務轉介是否順暢、入住前能否掌握全部費用、醫療紀錄能否連續、投訴能否限時處理、退出和回港安排是否清晰，以及長者與家屬的信任是否提高。只有把這些結果納入指標，安老政策才能由「有措施」走向「有成效」。

首份五年規劃為香港提供了一次難得機會，將分散於社福、醫療、房屋和區域合作的措施，整合成一套可持續的長期照護制度。當本地服務穩固、跨境選擇可靠、服務能隨需要銜接，香港才有能力讓每一位長者在社區、院舍或大灣區生活圈中，都享有安心、有保障、有尊嚴的晚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準教師入行難？裝備「一經驗兩認證」迎AI與北都機遇

教育視野

鄧飛

近日，筆者接受媒體訪問，談及新畢業準教師面對當下教育環境、特別是入行困難的問題。的確，面對香港結構性人口下跌，加上各種社會因素影響，部分學校正面對收生寒冬。有數據顯示，今年5月教育局公布在新學年獲「派零班」的小學增至15間，而當局於7月更收到27間幼稚園的停辦通知。這些宏觀數據看似凜冽，但對於滿腔熱誠準備投身教育界的年輕人而言，筆者認為不僅沒有悲觀的理由，當下反而是教育範式轉移、重新洗牌的黃金契機。總結而言，我為準教師提供幾項意見，並點出未來的突圍之道。

第一，縮班殺校，不必然帶來教師隊伍的不穩定。

很多社會輿論容易將「保學校」與「保教師」混為一談，但這兩者其實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兩者不一定相關，必須細細品味。一所學校因為區內生源不足而面臨停辦或合併，這本質上是教育行政與硬件資源調配的結果；然而，保持教師隊伍的穩定與教師整體的職業發展機會，卻關乎整個香港教育系統質素的底線。

高質教育需求並未改變

隨著學生人口波幅的變化，當局其實具備多種政策工具來消化衝擊。例如，整體社會對教育質素的要求只會不斷提高，這意味著政府可以透過進一步優化班師比例、推動小班教學、加強教師帶薪進修機

制，甚至藉着學校重置將資源引導至新發展區，來維持專業教學團隊的穩定。換言之，學校這個實體的「殼」或許會因為地區人口老化或遷移而消失，但社會對優質教育及專業教師的總體需求依然堅挺。因此，準教師不必被「殺校潮」的新聞標題嚇退，教育專業的剛性需求與長遠發展空間並未改變。

第二，放眼多元辦學體系，盡可能累積前線教學經驗。

準教師在求職時，不要急着非要擠進職業保障度最高的官立或資助學校。年輕人理應擴闊視野，不妨放眼國際學校、私立學校，以至補習學校或新興的教育科技機構。教育的本質在於「教與學」的互動，這些非傳統資助體系同樣面對着不同背景、不同學習動機的學生。例如，國際學校能培養探究式學習的視野，而補習學校則極度考驗教師的課堂吸引力與精準解難能力。這些地方都能為初出茅廬的教師提供極佳的實戰練兵場，只要能累積真實的課堂管理與教學經驗，這些履歷絕對是你未來職涯的加分項。

第三，迎向AI數字教育重構版圖的浪潮。

除了人口結構的變化，教育界正迎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AI數字教育的浪潮來得比想像中更快、更猛。

在這場變革中，年輕準教師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你們因年輕而成為數字教育的天然掌握者。因此，準教師不但要在日常教學實踐中大膽運用AI賦能教學（例如利用生成式AI輔助設計差異化教材、

進行數據化學習評估），而且要主動出擊，爭取獲得與AI教育相關的資格認證，讓自己成為學校推動數字轉型的先鋒。

網絡時代帶來新輔導要求

第四，掌握AI網絡時代的價值觀教育與輔導專業。

科技越是冰冷，教育越需要人文的溫度。年輕教師本身就是「數碼原住民」世代，對於Z世代和Alpha世代的學生有着天然的親近感與同理心。這些伴隨着智能手機與演算法長大的孩子，面對着網絡欺凌、資訊超載、以及虛擬世界帶來的價值觀撕裂，對於他們的成長輔導、價值教育及品格教育，無論從教育內涵還是教育手法上，都有着有別於傳統的全新要求。

總括而言，準教師如果能為自己定下目標，在未來兩到三年之內，努力拚搏拿下「一經驗、兩認證」——即扎實的「課堂教學經驗」，加上「AI賦能教學」與「AI網絡時代輔導教育」這兩項核心認證，你的競爭力將會產生質的飛躍。

放眼未來，隨着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引擎加速推進，未來將有大量高端科研及創科人才匯聚於此。這些高學歷人才本身重視子女教育，對教育質素要求極其嚴格，往往將子女教育列為轉工遷居的首要考慮。當北都的發展帶動龐大的優質人才與相應的子女教育需求時，擁有「一經驗、兩認證」、既懂前沿科技又懂網絡時代心理輔導的年輕老師，又何愁不能在這片新天地大展身手？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黃少康

有話要說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將爭取於9月內發表首份五年規劃。這份聚焦中長期戰略，側重前瞻性、指引性的綱領性發展文件，不僅標誌着香港管治思維跳出過往短期施政的傳統模式，更意味着香港正式視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為發展戰略目標，為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寫下開創性的一頁。

在目前為止整個五年規劃的編制過程中，包括政府成立編制小組，優化與立法會之間的意見收集機制，以及舉辦多場公開諮詢會，既可見政府的責任擔當，亦可見編制工作採取有別於過往制訂一般政策時的全新模式。

其一，以全社會協同形式廣納民意。

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不僅僅在民政中心派發文件，還同步上線專題網站開放線上意見提交通道，同時先後舉辦數十場分別面向立法會議員、各界別代表、普通市民的專場諮詢會，徵集超過13800份意見，廣泛凝聚共識。從商界對產業升級的期待、青年群體對就業創業空間的訴求，到普通市民對房屋、安老、教育、醫療等民生議題的關切，不同階層的聲音都被充分納入規劃的考量範疇。這種「先問計、後定稿」、自下而上的編制模式，打破了過往香港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意見壁壘，為將來各項政策實質落地掃清觀念障礙，讓原本分散的發展訴求逐步形成最大公約數，讓全體市民都成為香港未來藍圖的共同參與者，讓「發展紅利全民共用」的理念真正落到實處。

其二，發揮行政主導優勢，填補宏觀政策空白。

長期以來，香港的施政部署主要依託每年發布的施政報告，更多聚焦短期問題的應對，來處理土地開發、未來產業培育、跨區域基建協同這類需要十年甚

至更長周期布局的重大議題。結果是往往難以形成持續穩定的政策連貫性，容易出現「政策隨短期熱點搖擺」的問題。本次特區政府主動編制覆蓋中長期戰略的五年規劃，是行政主導治理模式的一次重要創新探索。而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則繼續以微觀角度落實五年規劃的戰略目標，優先保障重點領域的資源投入，徹底改變過往短期施政難以支撐長期戰略的困境。這種主動作為的施政姿態，充分體現了特區政府提升治理效能的決心，也向全社會清晰傳遞出行政主導體制下「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施政定力，讓香港的治理體系從被動應對問題，轉向主動謀劃未來。

其三，為香港應對動盪多變的國際形勢打好基礎。

當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緣衝突持續蔓延、貿易壁壘不斷抬升，全球營商成本大幅上漲，不少國際城市的傳統優勢在變局中被不斷削弱。在這樣的形勢下，「穩定」就是最佳的投資環境，「確定」就是最好的投資信號。五年規劃立足中長期視野，把北部都會區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培育、離岸人民幣樞紐升級等核心戰略——明確，相當於給所有市場主體遞上了一份「承諾書」，用「確定性」打破「不確定性」，讓從金融、創科，到高端服務業的各類投資者，都能看清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路徑，敢於布局周期更長、投入更大的優質項目。這種由制度性長期規劃築牢的穩定預期，正是香港吸引全球資本的核心底氣。

站在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即將發布，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一步。相信隨着五年規劃的落地實施，香港將在新的五年裏迎來更具活力、更包容、更繁榮的全新發展階段！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主席

從依賴美國到尋求戰略自主：《麥加協議》折射中東安全秩序變化

國際觀

文晶

2026年8月7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與巴基斯坦在麥加簽署《麥加共同防禦協議》。根據協議安排，針對三方中任何一方的武裝攻擊都將被視為對三方共同安全的挑戰，並觸發集體防禦機制。這一協議是在2025年沙特與巴基斯坦達成的《共同防禦協議》基礎上擴展而來，將土耳其這一具有北約成員國身份以及區域軍事影響力的國家行為體正式納入其中。由於協議中「共同防禦」條款在形式上類似於北約第五條，有關「中東版北約」正在形成的猜測與討論迅速出現。

對美安全承諾的重新評估

《麥加共同防禦協議》並非簡單的地區軍事結盟，而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組雙邊關係長期發展，美國長期主導的地區安全體系不確定上升的背景下，地區國家謀求構建自主、多元和多中心的地區安全架構的結果。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沙特與巴基斯坦長期保持制度化的軍事合作關係，2025年9月，以色列對美國盟友卡塔尔發動空襲，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國家加劇對美國是否能保證海灣同盟安全的擔憂。一周後，沙

巴兩國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議，雙方軍事合作快速深化，巴方通過防務合作和軍事人員培訓等方式強化對沙戰略安全承諾。土耳其與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建立在長期政治互信、共同戰略訴求以及防務工業互補的基礎之上。近年來，雙方合作逐漸從傳統軍事合作擴展到戰略協調、聯合軍事演習和軍工合作。土耳其與沙特關係原本是三邊關係中最薄弱的一環。「阿拉伯之春」後，兩國因對穆斯林兄弟會、地區政治轉型等問題立場不同，雙邊關係長期處於低谷，2018年卡舒吉事件一度使得雙邊關係跌至谷底。2021年後，土耳其為緩解地區孤立、吸引海灣資本和擴大軍工出口而着力修復對沙關係。2022年兩國領導人實現互訪後，雙邊關係迅速升溫。

2026年初美以伊衝突爆發，區域安全環境急劇惡化，三國加快安全協調的步伐並推動原有合作向更具制度化色彩的多邊安全框架發展。美國提供的延伸威懾長期以來是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應對外部安全威脅、維持地區穩定的重要支柱。然而，本輪衝突暴露出這安全一模式的局限性：美國的軍事存在並未完全轉化為對盟友的有效防護，反而增加了這些國家被捲入衝突的風險。此外，美國也未能消除海灣能源設施和關鍵航運通道面臨的安全風險，這進

一步促使沙特重新評估傳統安全依賴模式，積極探索構建多元的安全合作機制。作為公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巴基斯坦長期以來與沙特保持密切軍事聯繫；而土耳其則是北約第二大常備軍規模國家，且正在積極發展與沙特的合作關係。因此，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方安全合作並非臨時安排，而是對美國安全承諾可靠性的重新評估以及長期雙邊關係積累的戰略考量。

從區域安全格局的角度看，《麥加共同防禦協議》並非意味着對美國主導安全架構的替代。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沙特和巴基斯坦也長期與美國保持密切軍事合作，三國現有的先進武器裝備、防空體系和情報能力仍依賴美國主導的安全網絡。同時，在遠程打擊、衛星偵察和海上安全保障等領域三方合作短期內也無力取代美國發揮的作用。因此，協議更多是對現有安全體系的強化 and 補充。

然而，若僅將麥加協議視為對美國安全體系的補充，則可能低估其更深層次的政治意涵。近年來，美國試圖以《亞伯拉罕協議》為基礎，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並在地區內構建以安全合作為核心、針對伊朗及其「抵抗軸心」網絡的區域協調機制。《麥加協議》則提出了另一種安全構想：沙巴土三國雖與伊朗

保持一定距離，但同樣反對以色列持續擴大軍事行動、使用武力單方面改變地區現狀。由此，協議試圖探索不同於「依靠以色列遏制伊朗」或「納入美國主導安全體系」的第三路徑。對沙特而言，這一舉動尤其象徵意義。作為本輪衝突中影響最嚴重的海灣國家之一，利雅得一度被視為美以推動地區力量重組、實現阿以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力量。然而，《麥加協議》的簽署表明，沙特維護自身安全利益並不必然以加入《亞伯拉罕協議》或接受以色列的地區安全角色為前提。在巴勒斯坦問題沒有取得實質進展、以色列地區軍事行動持續擴大的背景下，沙特對推進沙以關係正常化保持更高政治條件和自主空間。這也意味着，美國和以色列原本希望借助地區安全危機推動阿以和解的設想面臨新的挑戰。因此，《麥加協議》雖然短期內未能削弱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卻對美國塑造地區秩序的能力構成了更為直接的挑戰。

超越單純依賴外部安全保護

當然，《麥加協議》的簽署並不意味着一個穩定持久的地區安全聯盟已經形成。三國雖然在提升戰略自主、加強安全合作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作為伊斯蘭世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土耳其、沙特和巴

基斯坦都有自身的訴求，其戰略目標並非完全一致。土耳其的核心安全關切集中在敘利亞局勢、庫爾德問題和東地中海，巴基斯坦則需要同時應對印度、阿富汗局勢外溢和伊朗方向的壓力，沙特則更關切海灣穩定、也門局勢和能源設施、關鍵航運通道安全。因此，三方安全合作能否形成長期可信的集體防禦機制，取決於各方能否在地區衝突、戰略優先級以及對外關係平衡等關鍵問題上形成持續穩定的政治協調機制。

總體而言，《麥加協議》是一次地區安全權力的重新調整。未來中東安全秩序或許將呈現一種更加複雜的雙層結構：美國仍將在情報共享、核心軍事技術和區域威懾等方面發揮難以替代的作用，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地區大國則將通過新的安全合作機制加強風險應對、戰略協調立場，並提升戰略自主能力。儘管《麥加協議》的實踐效力尚待檢驗，但其出現已表明，中東國家正超越單純依賴傳統外部安全保護，努力尋求在既有國際安全體系內構建更加多元化、網絡化的安全架構。未來，中東安全秩序可能不再由單一外部力量塑造，而將演變為美國、地區大國以及跨區域夥伴共同參與的複合型安全格局。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者